

《東華漢學》第 36 期；75-11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2 年 12 月

## 蔡世遠選評諸葛亮文的箇中理趣 ——以《歷代名臣傳》與《古文雅正》為探討核心<sup>\*</sup>

謝定紜<sup>\*\*</sup>

### 【摘要】

康熙年間，蔡世遠編選《古文雅正》一書，其中選入 12 篇諸葛亮文，這樣的數量除了就《古文雅正》本身而言僅次於韓愈以外，在《古文觀止》等其他清代重要評點本大多只選入〈出師表〉的情況下，也是一頗耐人尋味的論題。因此，本文旁參同為蔡世遠所編撰的《歷代名臣傳》，發現兩者同樣強調了諸葛亮的「內德」，且其「德」的涵蓋面向甚廣，除了昭著的「義聲」以外，容人之雅量、廉潔之操守、謹慎之性格等無一不在《歷代名臣傳》中被凸顯，也無一不是《古文雅正》品評諸葛亮文時的重要切入點。相對的，就諸葛亮其人而言，用兵謀略並不是編者主要的考量；就諸葛亮其文而言，其寫作技巧亦非評點時著墨的重點。由此觀之，《歷代名臣傳》中提出的「儒者氣象」，以及認為諸葛亮符合孔子之所謂「道」、曾參之所謂「君子」的觀點，正是蔡世遠在「以

\* 本文之撰成，幸賴臺師大王基倫先生、臺大黃奕珍先生及匿名審稿人提供之豐富意見，於此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修身為作文之本」的理學家文學觀下，愛好並大量選入諸葛亮文的根本原因。同時亦可見得，雖然《古文雅正》其書同時標舉雅正，但至少就諸葛亮文而言，「其理之正」的重要性著實是更勝一籌的考量關鍵。

**關鍵詞：**諸葛亮、蔡世遠、古文雅正、歷代名臣傳、古文評點

## 一、前言

蔡世遠（1682-1733），字聞之，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從學於張伯行（1651-1725）、李光地（1642-1718），嘗先後助二人校訂、分修《先儒遺書》、《性理精義》，並著有《二希堂文集》，編有《古文雅正》<sup>1</sup>、《史傳三編》<sup>2</sup>等，於《清史稿》卷二九〇有傳，傳中記錄了其文集何故以「二希」為名：「『二希』者，謂功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幾真希元。」<sup>3</sup>由此可見蔡氏對諸葛亮（181-234）與朱熹（1130-1200）的極高評價。考量蔡世遠的師從及著述，其理學家身份推尊朱熹並不意外，然其何故對諸葛亮同樣高度頌揚乃至以之與朱子比肩，實為一耐人尋味的議題。

事實上，除了《清史稿》的紀錄以外，蔡世遠編選的《古文雅正》也顯而易見他對諸葛亮的熱愛，其選入諸葛亮文的篇目如下所列：

表1 《古文雅正》中的諸葛亮文<sup>4</sup>

編號	篇目	作者（出處）
1	〈策丞相亮詔〉	蜀漢後主

<sup>1</sup> 本文所採用的版本為清乾隆四十二年石竹山房刻本。

<sup>2</sup> 即《歷代名臣傳》、《歷代名儒傳》、《歷代循吏傳》，蔡世遠與朱軾（1665-1736）等人合編。本文將援以討論的《歷代名臣傳》為同治三年重刊本。

<sup>3</sup> 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4冊，頁10279。

<sup>4</sup> 表中「編號」即《古文雅正》原書目錄中編排的次序，「作者（出處）」則是蔡世遠標示的作者或出處。現有研究成果統計選文篇目時，往往僅計入了蔡世遠直接標為諸葛亮的幾篇，如趙友永：《蔡世遠〈古文雅正〉研究》即是一例。然而，〈策丞相亮詔〉有代筆之說詳後述，〈隆中對〉與〈說孫權〉兩篇的主體皆是諸葛亮的論對或說服之言，僅因選文涵蓋了「亮躬耕壘畝」或「先主至於夏口」等非出自諸葛亮之口的史書內容，故而被標為「出自《三國志》」。在這樣的情況下，以之為諸葛亮文實更符合二篇的要旨所在。因此，本文乃採「從寬統計」的取向，將〈隆中對〉與〈說孫權〉同列為諸葛亮文。趙友永之統計數量，可詳參氏著，《蔡世遠〈古文雅正〉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編號	篇目	作者（出處）
2	〈隆中對〉	
3	〈說孫權〉	《三國志》
4	〈與法正論治蜀〉	
5	〈正議〉	
6	〈前出師表〉	
7	〈後出師表〉 <sup>5</sup>	
8	〈諫絕孫權〉	諸葛亮
9	〈答李嚴書〉	
10	〈與李豐教〉	
11	〈與羣下教二則〉	
12	〈自表後主〉	

從上表可見，直接標明為諸葛亮所作者即有9篇，且〈隆中對〉與〈說孫權〉兩文實亦出自諸葛亮，〈策丞相亮詔〉則有「後主授權諸葛亮代筆」之說。<sup>6</sup> 從寬統計之下，其選入篇數總計12篇，超過了朱熹的11篇，為《古文雅正》中僅次於韓愈（21篇）的單一作者選文數第二名。<sup>7</sup> 這樣的數量單就《古文雅正》本身的選文傾向而言已經不容忽視，若比對其他重要的清代評點本，更可見其特殊之處：

<sup>5</sup> 〈後出師表〉的作者向來有爭議，然而蔡世遠於此除了直接標定作者為諸葛亮以外，於評點時亦有「前表氣較雄」，「後表曉諭多端」等語。由此可見，至少蔡世遠對〈後出師表〉的作者並無質疑。因此，在考量本文之研究對象為《古文雅正》的前提下，本文並不擬細論此公案，而選擇將此文同列為諸葛亮所作。

<sup>6</sup> 說參漢·諸葛亮著，張連科、管淑珍校注，《諸葛亮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頁11-13。張氏於其文中，以此文出自《諸葛亮集》等理由，說明此文當為諸葛亮代筆之作，並將題目定為〈為後帝伐魏詔〉。

<sup>7</sup> 《古文雅正》中其他大量選文的作者（出處）依序為：韓愈21篇、《前漢書》13篇、朱熹11篇、《新唐書》9篇、《史記》9篇。

表2 清代重要古文評點本選諸葛亮文<sup>8</sup>

編者	書名	選入篇目
林雲銘（1628-1697）	《古文析義》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隆中對〉
康熙帝御選， 徐乾學（1631-1694）編注	《古文淵鑑》	無
過珙（?-1703）	《古文評註》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吳楚材（1655-1719）、 吳調侯（?-?）合編	《古文觀止》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余誠（1856-1926）	《古文釋義》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吳闡生（1877-1950）	《古文範》	〈前出師表〉

如上表所示，除了林雲銘的《古文析義》額外收入〈隆中對〉以外，其餘諸書大多僅收〈出師表〉，由此可見《古文雅正》收了如此數量的諸葛亮文，著實為一罕見的特例。然而，目前所見的兩篇前行研究卻皆未關注此一現象：趙友永《蔡世遠《古文雅正》研究》一文側重評點研究，主要研究重點為全書的評點符號用法及評語分類；阮莉《蔡世遠古文研究》<sup>9</sup> 則以《古文雅正》與《二希堂文集》為並重的兩條主軸，分別探討《古文雅正》的評語內容與《二希堂文集》中的古文創作實踐，給予《古文雅正》的篇幅更少，自然無暇顧及其選諸葛亮文的論題。

因此，本文將以蔡世遠對諸葛亮的評價為核心，嘗試以此為進路，解決《古文雅正》為何大量選入諸葛亮文的問題。首先，將以其與朱軾

<sup>8</sup> 選本排列以編者生年為依據，生年不詳的過珙則以其卒年置於徐乾學、吳楚材之間。後文將援以討論的各選本採用的版本如附：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康熙五十五年增訂合編本，1716）。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62）。清·余誠編，葉桂郴、劉果點校，《古文釋義》（長沙：岳麓書社，2003）。清·吳闡生編，王基倫、王誠御、許妙音點校，《古文範》（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9）。清·過珙，《古文評註》（臺北：宏業書局，1979）。

<sup>9</sup> 阮莉，《蔡世遠古文研究》（漳州：漳州師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

合編的《歷代名臣傳》為材料，透過與《三國志·諸葛亮傳》的對比及傳末所收之論贊，觀察蔡世遠在此傳中如何看待諸葛亮。<sup>10</sup> 接著，再以《古文雅正》本身對諸葛亮文的評語為材料，分析蔡世遠選諸葛亮文時的關注點。最後藉由諸葛亮傳、諸葛亮文評點及與其他清代古文選本的交叉比對，歸納蔡世遠選評諸葛亮文的箇中理趣，及其對諸葛亮個人的評價為何。

## 二、《歷代名臣傳》中的諸葛亮事蹟及評價

如前言所述，本節將著力探討《歷代名臣傳》（以下簡稱《名臣傳》）中記錄的諸葛亮事蹟，透過與《三國志·諸葛亮傳》（以下簡稱〈諸葛亮傳〉）的比對，觀察編者欲藉此凸顯什麼樣的特質。需要首先說明的是，此處所言的〈諸葛亮傳〉包含陳壽（233-297）所著的正文及裴松之（372-451）的注，因此，單純被《名臣傳》納入正文的裴注內容將不予討論。<sup>11</sup> 此外，由於蔡世遠隸屬朱熹《通鑑綱目》的「蜀漢正統」傳統，<sup>12</sup> 因此《名臣傳》中基於如此正統觀點而稍微改易的用字遣詞亦不

<sup>10</sup> 相對於《古文雅正》為蔡世遠所獨撰，《歷代名臣傳》的編纂則相對複雜，《四庫全書》館臣提要云：「名臣傳為張江、藍鼎元、李鍾橋所纂，……世遠商榷之而軾則裁定之。」據館臣之說，蔡世遠曾商榷張江等人所作的「名臣傳」內容，故其中的諸葛亮部分亦必曾經蔡世遠之手。除此之外，總觀《史傳三編》全書皆高度重視程朱理學，提倡經世致用、歌頌忠孝節烈、注重正統觀念等內容，亦皆與蔡世遠理學家身份的史觀高度相似。由此觀之，《歷代名臣傳》雖非蔡世遠一人之作，但仍可相當程度反映蔡世遠看待諸葛亮時的觀點與想法。提要之說，見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六十年杭州刊本，1795），頁28b。《歷代名臣傳》的史觀以及朱軾、蔡世遠等編輯群的史學思想，則可詳參曾存發《朱軾史學思想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sup>11</sup> 如諸葛亮猶隱居於荊州時，曾稱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可「官至刺史郡守」一事即屬此類。原文見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4冊，頁911。

<sup>12</sup> 蔡世遠於《古文雅正》目錄後有自述凡例一段，云：「三國遵朱子《通鑑綱目》以正統予蜀，故不先魏志也。」由此可見其蜀漢正統論。原文見清·

擬多加討論。<sup>13</sup> 基於上述考量，本節探討《名臣傳》中的諸葛亮將由三個角度切入：首先為《名臣傳》中不見於〈諸葛亮傳〉正文或裴注中的紀錄、其次為已被裴松之否定，但仍收入《名臣傳》的事蹟、再者則是於《名臣傳》最末所收錄的蓋棺論定式整體評價。

### (一) 《歷代名臣傳》中不見於《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記載

關於這類的內容，大部分雖不見於〈諸葛亮傳〉，但出現在其他人的傳中。不過於《名臣傳》裡，蔡世遠將這類原先於他傳「互見」的事蹟援引入正文，故以下將逐一分析兩傳的差異，以及被引入正文的他傳事蹟有何意義。

首先是建安十六年，諸葛亮與劉備入蜀時，《名臣傳》曰：

昭烈之攻張郃于漢中也，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  
 「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即無蜀矣，發兵何疑？」時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即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sup>14</sup>

蔡世遠編，林有席參評，陳守詒重校，《重訂古文雅正》（乾隆四十二年石竹山房刻本，1777），卷首，頁15b。林有席此重訂本主要增修處在於增添了一段「有席識」的文字，然本文並不納此為討論材料，故後文但凡再次徵引《重訂古文雅正》之文字時，為免繁冗皆仍僅以《古文雅正》稱之，特此註明。

<sup>13</sup> 如《名臣傳》全文多處改稱「先主」為「昭烈」、「曹公」為「操」。又孫權稱帝時，〈諸葛亮傳〉記錄的「稱尊號」、「慶權正號」，於《名臣傳》中被改為「僭號」、「賀於吳」。若此種種，皆反映《名臣傳》正蜀漢、黜魏吳之立場。「孫權稱帝」一事之原文分見：《三國志》，第4冊，頁924、清·朱軾、蔡世遠，《歷代名臣傳》（同治三年重刊本，1864），卷九，頁11b。

<sup>14</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4b。下引[旁批出處亦同，不另注。

這段事蹟出自《三國志·楊洪傳》<sup>15</sup>，於此，蔡世遠將原本〈楊洪傳〉中間與諸葛亮無關的事蹟刪去，單純援引最前與最後兩段作為強調諸葛亮「知人善任」的佐證：首先，於劉備求援時，諸葛亮選擇徵詢楊洪的意見，可見其明白楊洪通曉兵事的長才。再者，其任用楊洪為蜀郡太守後，收得「眾事皆辦」的效果，可見此次任命頗有見地。最後，在李嚴、楊洪舉薦部屬時，諸葛亮皆未遲疑、逕行舉用，可見其用人、行事之果決。另外，《名臣傳》記載此事之餘並有旁批云：「法正、楊洪、李嚴、何祇，武侯一時並用。」更顯然可見蔡世遠將這段本屬於〈楊洪傳〉中的文字挪用於此的用意，正是欲凸顯諸葛亮對手下人才「各得其所」的安排。

除上引楊洪等人外，諸葛亮對人才的重視猶反映在楊顥與杜微二人身上。先就楊顥言，《名臣傳》云：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亟諫，以為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亮謝之。及顥卒，亮垂泣三日。<sup>16</sup>

楊顥於《三國志》中無傳，此段記載深藏於〈楊戲傳〉的裴注中。案：楊戲於延熙四年嘗作〈季漢輔臣贊〉，稱頌此前活躍的蜀漢重臣。其中有〈贊王元泰〉一段，裴注於介紹王元泰時提到楊顥，故引〈襄陽記〉言及此事。<sup>17</sup> 蔡世遠於此將原先裴注中的完整諫言濃縮，摘要為「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並挪用了楊顥死後「亮垂泣三日」一語，蓋欲藉此段文字強調諸葛亮之察納雅言與重視人才。除此之外，於建興二年，《名臣傳》又載杜微之事：

二年，領益州牧，選用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杜微為主簿。微已老，舉而致之。既至，乞歸。亮以其重聽，于坐中與書曰：「曹丕稱帝，猶土龍鷁狗之有名耳。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

<sup>15</sup> 原文詳參《三國志·楊洪傳》，見《三國志》，第4冊，頁1013、1014。

<sup>16</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5b。

<sup>17</sup> 原文詳參裴注《三國志·楊戲傳》，見《三國志》，第4冊，頁1083。

道滅之。君但當以德輔時，則君軍旅，何為汲汲求去？」拜微諫議之大夫。<sup>18</sup>

杜微與楊顥不同，於《三國志》中有傳，此段事蹟亦改寫自其本傳。<sup>19</sup> 蔡世遠於此雖然濃縮了諸葛亮的座中之書，但對文意並無太大改易，除強調諸葛亮「以正道滅曹」的理想外，用意當為呼應「選用皆妙簡舊德」一語，更為突顯諸葛亮善待人才、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等面向。

除上述與「人才」相關事例外，另有兩條資料與《古文雅正》中選入的諸葛亮文相關。首先為〈與群下教〉，建興元年，《名臣傳》云：

進封亮武鄉侯，……作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千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sup>20</sup>

兩段〈與群下教〉的內容皆出自《三國志·董和傳》，用字遣詞上稍有不同，然文意亦無太大改動。<sup>21</sup> 較為關鍵的差異在於：《三國志》援引兩段文字的目的在強調諸葛亮「追思董和如此」；相對的，《名臣傳》的目的則可參看《古文雅正》中的評語：「讀此知剛復自用者，非徒德否，亦係才短。……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sup>22</sup> 旨在強調諸葛亮容納他人意見的度量。蓋蔡世遠於此可謂將原先用以稱頌董和的史料轉為稱許諸葛亮之才德。

除〈與群下教〉外，猶有〈與李豐教〉。《名臣傳》於諸葛亮死後，補述其嘗出教敕李豐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情感動，

<sup>18</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6b、7a。

<sup>19</sup> 原文詳參《三國志·杜微傳》，見《三國志》，第4冊，頁1019、1020。

<sup>20</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5a、5b。

<sup>21</sup> 原文詳參《三國志·董和傳》，見《三國志》，第4冊，頁979、980。

<sup>22</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18b。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否可復通，逝可復還。」<sup>23</sup> 並於此段引文前後言及廖立垂泣、李嚴病死、張裔稱「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等眾人對諸葛亮之死的反應。習鑿齒（?-383）對此評曰：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sup>24</sup>

蔡世遠於此雖未直接引用習鑿齒的評價，但藉由〈與李豐教〉可見孔明心心念念「戮力以獎王室」的「無私」初衷，透過廖立等人的言行則可反映眾人對諸葛亮的無怨與追念，其用意當與習鑿齒相去無多。

綜上所述，被援引入《名臣傳》中的他傳事蹟大抵可以分為三類：其一，對諸葛亮的直接讚揚之語，如〈楊洪傳〉中的「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即是；其二，改變了原本陳壽或裴松之的用意，將之轉而稱頌諸葛亮，如〈董和傳〉中的兩段〈與群下教〉即是；其三，雖未明言，但以他人之反應凸顯諸葛亮的正面形象，如諸葛亮死後廖立、李嚴等人的反應即是。要言之，雖作法不一，但評價內容則不脫善用人才、察納雅言、無私之德等面向。

## （二）《歷代名臣傳》納入正文的「乖刺」事蹟

如本節之引言所云，《名臣傳》中不乏直接將裴注〈諸葛亮傳〉之內容引入正文的例子，此類事蹟如諸葛亮躬耕壠畝時所言等，大部分無多加討論之必要，然而有兩條資料卻是裴松之已舉證歷歷質疑其真實性的「乖刺」之事，<sup>25</sup> 蔡世遠將此收入《名臣傳》中意義為何，又對諸葛亮之形象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此即本小節所欲解決的問題。

<sup>23</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14a。

<sup>24</sup> 語出《三國志·李嚴傳》，見《三國志》，第4冊，頁1001。

<sup>25</sup> 「乖刺」一語意指「悖謬失當」，裴松之於其注中即以此語批評郭沖五事云「知其乖刺多矣」，故本小節借用此語為題。原文見：《三國志》，第4

首先即是廣為人知的「空城計」，《名臣傳》載諸葛亮進〈前出師表〉後，北伐時與司馬懿交兵：

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僅留萬人守城。時魏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二十里所。偵候來告，舉軍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觀勢弱，疑有強伏，遂引軍北走。及後知之，深以為恨。<sup>26</sup>

此段記載與裴注引郭沖三事所言並無大異，<sup>27</sup> 旨在凸顯諸葛亮的慎謀能斷，因而得以從大劣勢中全身而退。然而，裴松之在引三事後即對其說大加駁斥：

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sup>28</sup>

裴松之的論據大抵有三：其一，曹真死於公元231年，而「空城計」一事發生在第一次北伐，是為公元228年，於時諸葛亮與司馬懿未曾交手；其二，司馬懿率兵二十萬，面對兵力孱弱的諸葛亮，即便疑有埋伏，於實力懸殊的狀況下，直接退兵亦不合常理；其三，從〈魏延傳〉可知，

冊，頁926。

<sup>26</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9b。

<sup>27</sup> 原文詳參裴注《三國志·諸葛亮傳》引郭沖三事，見《三國志》，第4冊，頁921。

<sup>28</sup> 同前註，頁922。

諸葛亮對魏延大膽計策往往「制而不許」，可見「將重兵交付魏延做前導」的決策著實與史實不合。反駁之後，裴松之又引《蜀記》中「郭沖對扶風王」一事，<sup>29</sup> 認為司馬駿在聽聞郭沖對其父司馬懿的詆毀後還「慨然善之」絕無可能，由此推論郭沖「所言皆虛」。誠然，單單根據《蜀記》中的記載就判斷郭沖之言「皆虛」可能顯得武斷，然而，其三項論據實仍有高度說服力，足以令人質疑「空城計」的真實性。另外，《三國志》正文與注文合刊由來已久，<sup>30</sup> 蔡世遠於編《歷代名臣傳》時所見的《三國志》當為附有裴注的版本，故亦當已知裴氏舉證歷歷的質疑，但仍選擇將此事收入《名臣傳》中，可見其欲美化諸葛亮形象、以司馬懿襯托諸葛亮用兵之長才的用心。

除「空城計」外，《名臣傳》載「木門道擊殺張郃」一役時亦有頗戲劇化的描寫：

時亮兵期直更番，而懿眾大盛。諸參佐咸請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行師以大信為本，今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令去。由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公恩，死猶莫報也。」臨戰各拔刀爭先，一以當十，遂大捷。<sup>31</sup>

此事同樣出自郭沖之言，<sup>32</sup> 且其原文之末除點出「大捷」的戰果以外，更明白揭示「此信之由也」，強調諸葛亮在大敵當前之際下令讓將士如期返家，正是如此「以大信為本」的用兵方針，讓蜀軍上下一心，願以

<sup>29</sup> 事參裴注《三國志·諸葛亮傳》引《蜀記》，見《三國志》，第4冊，頁917。

<sup>30</sup> 說可參張子俠，〈《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2000.5），頁74-79。劉奉文，《〈三國志〉版本的諸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兩文對《三國志》的正文與注文之關係皆不乏頗有見地的觀點，亦提及了正文、注文合刊以後造成的「注文混入正文」等問題，由此可見「合刊」作法由來已久。

<sup>31</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12b、13a。

<sup>32</sup> 事參裴注《三國志·諸葛亮傳》引郭沖五事，見《三國志》，第4冊，頁926。

死相報。這條事蹟不同於「空城計」側重「用兵之才」，反而更強調「用兵之信」，無疑對形塑諸葛亮的正面形象助益不小，然而卻也正是此事引得裴松之的「乖刺」批評：

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沖言，知其乖刺多矣。<sup>33</sup>

裴松之於此同樣提出了三點論據：其一，前次北伐已經驚動曹叡親自到長安坐鎮，這次北伐不太可能再次御駕親征；其二，從地理關係來看，諸葛亮大軍在前、劍閣在後，魏軍無由跨越蜀軍直取劍閣；其三，諸葛亮的軍隊並無久駐規劃，當時亦在還蜀途中，不應有「兵期直更番」一事。因此，裴松之再次否定了郭沖之言，並以孫盛、習鑿齒皆不取為由，論斷郭沖所言乖刺頗多。與「空城計」的狀況頗為接近，蔡世遠即使面對確鑿的舉證，仍然選擇收入此事，由此可見其意欲強調孔明之「信」的目的性。

綜上所述，《名臣傳》在編入兩段事蹟時，理應明確知悉兩事的可信度並不高，然仍選擇以之入傳，無疑是因其與蔡世遠所欲形塑的諸葛亮形象不謀而合，簡言之即是對「用兵之才」與「用兵之信」的凸顯，令諸葛亮的正面形象更趨豐富與深化。

### （三）《歷代名臣傳》篇末論贊對諸葛亮的評價

《名臣傳》全傳之末的論贊共有三段，其一為眾所週知的陳壽評語、其二為吳人張儼的評價、其三即為《名臣傳》編者自行寫定的論贊，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必須論及的是陳壽於〈諸葛亮傳〉之末的評語，其言曰：

<sup>33</sup> 同前註，頁 926。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sup>34</sup>

陳壽此段評語對諸葛亮推崇頗高，然其稱頌之語主要聚焦在內政之長才，如對百姓開誠布公，賞善罰惡時一本於法，終於使得蜀漢得以為治。且正如前引《名臣傳》中所示，諸葛亮死後廖立、李嚴等皆為之感激，誠可謂「刑政雖峻而無怨者」，故陳壽於此亦不吝盛讚其為「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然而，陳壽卻也提出了諸葛亮致力北伐，多次未能成功的事實。因此，同時給予了「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的批評。陳壽以諸葛亮為不善用兵的論斷歷來招致不少爭議，<sup>35</sup>《名臣傳》於此雖未提出對此評價的看法，但參看《古文雅正》卻能藉以一窺蔡世遠如何看待陳壽的此評，其總評〈上諸葛亮文集表〉云：

案陳承祚之於諸葛公，反復嗟嘆，崇闡不遺餘力矣，乃晉書傳中，或以謂公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至唐，裴晉公、孫可之猶沿此論，不知敵國史臣，體自應爾，至並為推原出師未捷之故，此何異浣花叟之淚滿襟，玉溪生之恨有餘耶？<sup>36</sup>

於此段文字中，蔡世遠將陳壽的批評歸因於其「敵國史臣」的身份，認為這是陳壽不得不然的評價，且以之為對諸葛亮出師未捷的感嘆，可與

<sup>34</sup> 同前註，頁 934。

<sup>35</sup> 如後世詠史詩中便不乏質疑陳壽之說，或諷刺其為「成敗論英雄」的句子，如李曾伯〈以勸分出伏龍因謁武侯廟〉詩曰：「成敗論人陳壽史，功名餘恨少陵詩。」文天祥於〈懷孔明〉一詩中云：「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兩者或直言質疑、或反話諷刺，蓋皆反對陳壽論點之例。李詩見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 62 冊，頁 38736、文詩見《全宋詩》，第 68 冊，頁 43047。

<sup>36</sup> 見《古文雅正》，卷五，頁 21a、22b。

杜甫（712-770）〈蜀相〉<sup>37</sup>、李商隱（813-858）〈籌筆驛〉<sup>38</sup>齊觀。且不論蔡世遠的解讀是否得當，至少由此可知即使《名臣傳》引用了完整的陳壽論贊，但蔡氏對「將略非長」之說應是不以為然的。

相對於陳壽之評獲得完整保存，第二段的張儼之評則遭掐頭去尾，僅餘下中間一段：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sup>39</sup>

這段評語同樣已見於《三國志》中，裴松之注〈諸葛亮傳〉時於傳末引「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收錄全文。兩相對照之下，可以發現前段將諸葛亮與司馬懿並列的文字，以及後段對諸葛亮「征伐天下，未為得計」的爭論<sup>40</sup>皆遭刪去，《名臣傳》所引的段落旨在凸顯蜀漢之國小兵寡，較之大國曹魏僅九分之一，但卻仍有直搗河、洛的壯志。同時描寫大國之將司馬懿，以十倍之地卻始終無法擒敵，而只能「務自保全」，從而提出「孔明不死」的假設，與「將略非長」之說持相反意見，認為諸葛亮將能使得「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

除卻前引兩段他人評語，《名臣傳》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編者自作的論贊，論曰：

<sup>37</sup> 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見清·曹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卷二二六，頁2431。

<sup>38</sup> 李商隱〈籌筆驛〉：「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見《全唐詩》，卷五三九，頁6161。

<sup>39</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15b、16a。

<sup>40</sup> 前後所刪文字可詳見《三國志》，第4冊，頁935、936。

亮有王佐才，氣象一本於儒者，孔子謂「求志達道」、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庶幾近之。要其全體大用，不外乎誠子一書、出師二表，文中子曰：「孔明無死，禮樂可興。」由是觀之，則富國強兵乃其囊底餘智耳。陳壽上亮遺集表，至以周公、子產相比，凝然。論贊中有「將略非長」之言，其後崔浩又從而傳會，沿及眉山蘇氏父子，皆答亮不取荊州而都梁益。夫隆中一對，先荊後益，唯有成算於胸中，是以坐言起行，不爽尺寸。蘇洵輩好以事後之成敗論人，強詞悍氣、不衷事理，惡足與窺古人之深哉？亮自比管樂，有過之無不及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誦杜甫詩，益信。<sup>41</sup>

這段評語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以諸葛亮為「儒者」。這樣的分類並非《名臣傳》的創見，早在兩晉時期，即有以孔明類比儒家先賢的例證，如裴注引《袁子》云：「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sup>42</sup> 張輔(?-305)〈名士優劣論〉中亦有相似論述，其言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節矣。」<sup>43</sup> 隱然有將孔明比擬為伯夷之意。由此觀之，導因於諸葛亮之忠義與遺風，自兩晉以來即不乏視之為儒家君子者，此一脈絡下最典型且具代表性的盛讚，當推《朱子語類》。朱熹回答門人提問時，嘗有言曰：「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卻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sup>44</sup> 由朱子此言可以見得，諸葛亮的「儒者」身份在後世誠然是獲得高度肯定的。如此之說對於理解蔡世遠對諸葛亮的推崇至關重要，正如前言所云，蔡世遠具有理學家身份，因此，若諸葛亮符合孔子之謂「道」、曾參之謂「君子」，則其對

<sup>41</sup> 見《歷代名臣傳》，卷九，頁16a-17a。

<sup>42</sup> 見《三國志》，第4冊，頁934。

<sup>43</sup> 見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上冊，頁409。又此條資料轉引自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特此註明。

<sup>44</sup> 宋·朱熹：《朱子語類》（同治正誼堂叢書本，1866），卷一三六，頁2b。

諸葛亮的盛讚便應不止於「功業」，「道德」與「忠義」等君子操守應是更重要的內涵，可以視為蔡世遠心目中兼善天下的儒者典型。接續著對諸葛亮「儒者」身份的肯定，評語的第二部分即引文中子（即王通，584-617）之說，認為若孔明不死，則禮樂之復興可待。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於《中說·王道》中的原文是疑問句：「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sup>45</sup> 究竟其原意是可興或不可興，其實未可確定。<sup>46</sup> 然而，《名臣傳》於此直接將其改為肯定句，並稱「富國強兵」僅是「囊底餘智」，這樣的評價一方面可見對諸葛亮的高度讚揚，二方面也可見得「富國強兵」並非蔡世遠的主要考量。評語的最後一部分則可結合前引《古文雅正》中對〈上諸葛亮文集表〉的總評，視為對陳壽「將略非長」之言的回應，且其立場可謂與總評一以貫之，皆將矛頭指向後世贊同此言者，如此處即對蘇洵父子「以成敗論人」的作法大加批評。蔡世遠「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觀在〈歷代名臣傳序〉中亦有體現：

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sup>47</sup>  
 於此，蔡世遠將諸葛亮與陸贊、范仲淹、司馬光並列，視為「王佐之才、帝王之師」。如此強調孔明才能與功業的觀點，在《二希堂文集》中也能夠找到例證，如〈鹿洲初集序〉稱：「平生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sup>48</sup>  
 〈與陳滄洲總河書〉則云：「世遠竊觀大臣之有名績者，漢有鄧留、魏丙、諸葛公。」<sup>49</sup> 或稱「經濟」、或稱「名績」，明顯不以其敗為意，可以再次證明雖然《名臣傳》並未刪節陳壽的評語，但蔡世遠對諸葛亮的才華仍是通盤肯定的，因此在最後給予了「有過管、樂而無不及」的評價。

<sup>45</sup> 隋·王通：《中說》，收入《續古逸叢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第39冊，頁11。

<sup>46</sup> 如程頤回答學生的提問時，便云：「禮樂則未敢望。」見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六安塗氏求我齋所刊書，1871），卷一九，頁18b。

<sup>47</sup>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收入李升召等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592冊，頁35。

<sup>48</sup> 同前註，頁64。

<sup>49</sup> 同前註，頁140、141。

綜合以上三個小節的討論，於此可以整理出《歷代名臣傳》書寫諸葛亮的幾個面向：首先，《名臣傳》納入了對於諸葛亮「善用人才」、「禮賢下士」及「用兵之信」的描寫，使〈諸葛亮傳〉中的既有正面形象更趨豐富；再者，「空城計」一役雖然真實性有待商榷，但卻仍被收入，結合序言的稱頌和篇末論贊中對「將略非長」的解釋，可知《名臣傳》中的諸葛亮可謂同時長於「用兵」與「治國」，並無後人如三蘇所謂之「短板」；其三，〈諸葛亮傳〉中對於孔明死後的描寫相對薄弱，《名臣傳》於此遂收入了其他蜀漢之臣的反應，用以強調其深得人心，並可呼應陳壽評語中的「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之語，凸顯了他的內政長才；最後，透過論贊中直接標舉諸葛亮「儒者氣象」的評語，及稱其符合孔子之「道」、曾子之「君子」的現象，可知《名臣傳》中的諸葛亮可謂蔡世遠心目中的儒者典型。

### 三、《古文雅正》中對諸葛亮文的評點

透過前節釐清蔡世遠對諸葛亮的看法之後，即可更進一步梳理《古文雅正》中對諸葛亮文的評語。首先必須說明的是《古文雅正》一書評諸葛亮文時，其評語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單就諸葛亮其人表述稱頌之意或嘆惋之情，如〈正議〉總評稱「義炳日星，辭嚴斧鉞」即屬此類。<sup>50</sup> 其二，將諸葛亮與其他歷史人物比較，如〈說孫權〉總評比較諸葛亮與周瑜的「智略大小」即是。<sup>51</sup> 其三，考據文字版本問題，如〈前出師表〉總評特別將「營中之事」提出來討論其後是否亦有「事無大小」四字即然。<sup>52</sup> 其中第三類評語雖在清代古文評點本中比比皆是，然於《古文雅正》評諸葛亮文時卻格外罕見，僅〈前出師表〉一例，又

<sup>50</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 9b。

<sup>51</sup> 同前註，頁 7a。

<sup>52</sup> 同前註，頁 11b、12a。

其內容與對諸葛亮其人其文的評價並不相關，因此後文並不擬針對這一類別多加討論，而將聚焦於第一類與第二類的評語內容，據以觀察蔡世遠藉此表現出對諸葛亮的何種看法。

### (一) 對諸葛亮的稱頌與嘆惋

正如前節所示，《名臣傳》論贊將諸葛亮評價為「氣象一本於儒者」，又以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稱之，可見其「儒者氣象」與「大節」正是蔡世遠極其重視的人格特質，這樣的觀點在《古文雅正》中亦可見顯著的對應例子，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是〈正議〉一例。

〈正議〉一文有題下注述明寫作背景：「時魏臣華歆、王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sup>53</sup> 蓋為回應華歆、王朗招降信而作。文中對曹魏的「篡逆」行為多有直接攻訐之筆，如「子桓淫逸，繼之以篡」即然，蔡世遠並於此句之側旁批道：「稱其字，斥其淫逸，指其篡，令讀者起舞。」<sup>54</sup> 「起舞」的形容在《古文雅正》中並不多見，另一處為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的總評：「巡、遠在地下應掀髯起舞，讀者亦掀髯起舞。」<sup>55</sup> 蔡世遠對韓愈此文以及所呈現的張巡之忠義皆大為讚嘆，可見「起舞」的形容當指自身作為讀者時的激奮、激賞之情。因此從這段旁批可知，蔡世遠顯然與諸葛亮持同一意見，對「不義」的曹魏頗有微詞。其後於總評處則所言更明：

義炳日星，辭嚴斧鉞，卻以羽扇風流出之，諸葛君果名士也。<sup>56</sup>

此處評語雖短，但內涵豐富，可以細分為三個層次：一則為諸葛亮如日星般的內在之義、二則為嚴如斧鉞的表現之辭、三則為羽扇風流的外在形象。一般人殊難兼備三項，尤其「義炳日星，辭嚴斧鉞」的情況下，更不易以「羽扇風流」的瀟灑形象展現「義正辭嚴」，因此在三層意涵

<sup>53</sup> 同前註，頁 9a。

<sup>54</sup> 同前註。

<sup>55</sup> 同前註，頁 14b。

<sup>56</sup> 同前註，頁 9b。

推進之後，蔡世遠最終稱許諸葛亮為「名士」，一方面將其與〈正議〉體現的「義」相連結，二方面則稱頌作者本身的風骨，可以見得蔡世遠對諸葛亮其人的高度肯定，至能與日星爭輝的地步。相似的讚揚之語亦見於〈後出師表〉的總評之中：

前表氣較雄，有吞曹魏之心，後表曉諭多端，只是以死濟之。公于是時，亦知費手做但不得不如此做耳。程子云：「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讀其書，堪與天日並垂也。<sup>57</sup>

這段評語首先比較了前後〈出師表〉的文風：〈前出師表〉作於第一次北伐前，於時曹丕新死、魏國於漢中一帶防備較弱，因此戰局樂觀，猶能展現「吞曹魏」之雄心；到了〈後出師表〉則不然，街亭敗後，第一次北伐功敗垂成，因此其後諸葛亮自己也心知肚明北伐之路艱辛難為，然而卻又不得不為，因此難以再現雄心，但能「曉諭多端，以死濟之」。就評語的前段而言，討論的主要は文風與當時的歷史情境，但後段則筆鋒一轉，引程子的評價將〈出師表〉與〈伊訓〉、〈說命〉並列，將文章並舉的同時，事實上亦有令諸葛亮躋身伊尹、武丁等名相之流的用心。因此，最後總評其可「與天日並垂」，將對其文其人的肯定提升至無以復加。

若將眼光放到〈策丞相亮詔〉，則更可見這樣的「義」已然成為應當遵循的典範，其總評云：

聲罪致討，詞嚴義正，當時魏吳非無檄文佳篇，然不可傳者，國僭詞遁也。然則世之以身許國，屬筆為文者，亦有幸不幸焉。是以君子慎所擇。<sup>58</sup>

此段評語前段與評〈正議〉的內容相近，皆以「詞嚴義正」總括，中段則旨在說明魏、吳檄文不可選的原因：前一節中已經論及，蔡世遠採朱熹《通鑑綱目》的蜀漢正統論，故魏、吳兩國皆是僭越，不可傳其檄文。基於這樣的理由，他更進一步發揮議論道，以身許國者亦當觀察此「國」

<sup>57</sup> 同前註，頁 14b。

<sup>58</sup> 同前註，頁 2b。

是否為「僭國」，否則屬筆為「不可傳」之文，實屬不幸。綜觀《古文雅正》，也確實未收入當時文章大家陳琳的檄文名篇如〈為袁紹檄豫州〉、〈檄吳將校部曲文〉等等，可見評語中提到的「國僭詞遁」與「君子慎所擇」不只是立身處世時的重要考量，也是蔡世遠自己編選《古文雅正》時遵循的準則，其自序中所稱的「措之為君臣之倫」和「其理正」可以遙相呼應。<sup>59</sup> 除了諸葛亮及蜀漢所代表的「義」堪為後世君子「慎所擇」依循的標竿外，其個人修養亦堪為後人之典範，可參〈自表後主〉的總評：

以諸葛公之才，至其自許也但曰謹慎，其遺表自明也，但以廉耳。  
以此知心粗氣浮人，做不得些少事業，而利心未斷之人，終為小人之歸耳。<sup>60</sup>

該文為諸葛亮死前上奏劉禪的奏章，故於此以「遺表」稱之。文中「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等語，與其〈誠子書〉中的「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可以呼應，表現了諸葛亮的高尚人格與節操。這段評語對文中呈現的品格並無過多著墨，但結合了〈前出師表〉中的「先帝知臣謹慎」之語，認為透過諸葛亮自許自期的「謹慎」與「廉潔」，正可見得這兩者是他最重視的人格特質，由此興發後段的議論，強調「心粗氣浮」（與「謹慎」相對）者難成大事、「利心未斷」（與「廉」相對）者終為小人。據此可知，諸葛亮樹立的標準並不僅限於大義，戒心粗氣浮、戒利慾之心，皆是後人透過諸葛亮所應學習的處世之方。

諸葛亮之操守除了堪為效法的楷模以外，更能感動人心。有言「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蔡世遠於評〈出師表〉時亦有相似的感受，如旁批〈前出師表〉「臣本布衣」一段云：「從肺腑流出，每讀此，無不墮淚也。」<sup>61</sup> 旁批〈後出師表〉「關羽毀敗」一段云：「千古恨事，

<sup>59</sup> 《古文雅正》，卷首，頁 2a。

<sup>60</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 19a、19b。

<sup>61</sup> 同前註，頁 10b。

讀此墮盡英雄之淚。」<sup>62</sup> 皆是其對諸葛亮及蜀漢的際遇憾恨、嘆惋的例子。然而在《古文雅正》中，令人「墮淚」的不只出師二表，猶可參看〈答李嚴書〉，此文同樣有題下注：「李平，初名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賜，進爵稱王，亮答之。」<sup>63</sup> 蓋為回絕李嚴「進爵稱王」之提議的書信，其總評曰：

語本血誠，兼可愧勵僚屬，諸葛公短札，千載下猶令人心動，況身受者乎？<sup>64</sup>

認為諸葛亮這封書信即便是千載後的後人讀之，猶為心動，據此推斷親身受之的李嚴當更為感觸。至若其「血誠」之處何在？則或可參本文「滅魏斬叢，帝還故居」的旁批：「志豈嘗須臾忘鄖哉？」<sup>65</sup> 此句評語典出《史記·伍子胥列傳》的「太史公曰」<sup>66</sup>，蔡世遠於此挪用，當指為漢室復仇之大志而言。正如《古文雅正》中選入的另一篇三國文，趙雲〈駁諸將田地議〉中所引的霍去病之語：「匈奴未滅，無用家為。」<sup>67</sup> 諸葛亮於此信中的志意亦當相通——「國仇未復，無用家為」，在「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大志未遂之前，九錫之禮或進爵稱王皆毋需討論。正是如此「血誠」，凸顯了諸葛亮的高潔，也令後人為之「心動」。除此封書信外，亦可參〈與李豐教〉的總評：「諸葛公語語刺人心骨，宜乎既沒之後，李嚴傷痛不已也。讀至策後人不能故也一句，有心人猶為流涕。」<sup>68</sup> 評語後半同樣稱許此文能令有心人流涕，前段則可結合《名臣傳》加入正文的「諸葛亮死後」之記載，蓋為透過李嚴之悲，凸顯諸葛亮言行之動人。

<sup>62</sup> 同前註，頁 14a。

<sup>63</sup> 同前註，頁 16a。

<sup>64</sup> 同前註。

<sup>65</sup> 同前註。

<sup>66</sup> 《史記·伍子胥列傳》：「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鄖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 7 冊，頁 2183。

<sup>67</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 25a。

<sup>68</sup> 同前註，頁 17a、17b。

綜上所述，可以整理得知《古文雅正》中對諸葛亮個人的評語大抵圍繞在其忠義節操與道德修養上，可與《名臣傳》中的論贊內容相呼應，見得蔡世遠真正重視的仍是儒者氣象，至若「富國強兵」等功業之績，雖然在〈歷代名臣傳序〉和《二希堂文集》的部分作品中被提及，但卻只是「囊底餘策」，於《古文雅正》中亦非關注的重點。

## （二）諸葛亮與其他歷史人物之比較

《古文雅正》評諸葛亮文時，除了前述針對其人做個別稱許之語的例子外，亦不乏將諸葛亮與其他人物對比的作法。而對比的對象可以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亦有向前朝或後世比較者，手法多變，以下即將就此類評語進行討論。

首先如前節所言，孔明之「義」實為蔡世遠極其重視的人格特質，此一特色也毫無懸念的被套用到與其他人物的比較中，可參〈與法正論治蜀〉之總評：

子產、孔明皆千古大人物，其忠誠奉國，綜核名實，亦略相類，所處之地不同耳。子產局于小國，無可措手處，孔明當僭魏之時，義聲昭著，千載下更令人崇拜。此篇要當與子產〈與子太叔論政〉參看。<sup>69</sup>

該篇文章旨在告知法正治蜀不宜一味放寬標準，否則將使得「威刑不肅」。究其內容言，著實與子產死前告諭子太叔之語高度相似，<sup>70</sup> 皆認為執政宜猛不宜寬，因此蔡世遠於此亦將孔明與子產並舉比較，評語除末句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稱頌兩人皆是「忠誠奉國」的「千古大人物」，著眼在其「同」；第二部分則提出了「同中之異」——子

<sup>69</sup> 同前註，卷五，頁 8a、8b。

<sup>70</sup> 《古文雅正》不選先秦之文，故〈與子太叔論政〉並未被選入，且此題為後人所加，其意指當為《左傳·昭公二十年》之事：「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見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 4 冊，頁 1421。

產身處弱小的鄭國，面對天下大亂難以措手。諸葛亮則不然，其於曹魏篡逆之際勇於對抗，因此贏得「義」之名，也因此較子產更受景仰。要言之，於此蔡世遠以諸葛亮優於子產，其關鍵點正在於前文不斷言及的「大義」。相似比較也見於〈後出師表〉的總評：

管葛並稱，兩人之才亦不相下，其治國也，或以為管涉功利，葛庶幾禮樂，此中亦若有辨，但所處之地各不同，管當日不敢代周天子而君之，迫于大義，想出伯諸侯，已無別法，卒為所欲為。葛仗義執言，只一條鞭。論事勢，管順手而葛費手；論情形，管周折而葛直捷。<sup>71</sup>

此段評語比較的對象為諸葛亮與管仲，相對於〈與法正論治蜀〉比較子產時言二者之同處不少，此處則多著墨於二者之異：管仲身處春秋時期，不可代周天子，以禮樂殊難出霸諸侯，因此僅能涉於功利；相對的，諸葛亮以討伐曹魏為號召，自始至終皆仗大義而執言，無甚問題。也因此，從「情形」來看，管仲無法如孔明般直截了當；然而若著眼於國家事勢，則身處強齊的管仲不若諸葛亮之費手難為。這段評語與前段論子產者相較，最大的差異處在於未明言優劣，然而若矚目「管當日不敢代周天子而君之」一語，卻仍可見在蔡世遠心中，管仲有著「取而代也」的他想，唯因「大義所迫」而不得為。由此觀之，「仗義」的諸葛亮實仍較懷有二心的管仲更勝一籌。

然而正如前一小節所論，在「單評諸葛亮」的評語中，除「義」以外，蔡世遠猶標舉了謹慎、清廉等人格特質。這一小節所欲討論的內容自然亦不侷限於「義」，而猶有其他比較面向，首先可參〈前出師表〉之總評：

須看其引君子道，用人當可，處置件件周詳，故曰謹慎也。殷深源輩無論矣，張魏公當日忠肝義膽，非不炳烈，曾有此處置得宜否？<sup>72</sup>

<sup>71</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14b。

<sup>72</sup> 同前註，頁11a、11b。

此段評語的著眼點與前引〈自表後主〉的總評相近，皆側重「謹慎」，並進一步探及「謹慎」的內涵，亦即「引君子道，用人當可」等處置，而後更以殷浩、張浚為陪襯，凸顯諸葛亮之周詳得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蔡世遠雖未明言，然而透過「忠肝義膽，非不炳烈」一語其實亦可得知孔明同時兼具這項特質，而後之「曾有此處置得宜否」的評判，實乃立基於兩人「忠義炳烈」的共性上而為。故而此段評語當可視為在「忠義」之外納入其他面向的比較之例。除了同樣「忠義」的陪襯型人物外，猶有得諸葛亮真意的他朝名臣，可參〈後出師表〉，其旁批「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句云：「韓魏公每處大事，置身家性命於度外，正得此意。」<sup>73</sup> 蓋即以韓琦為正例，認為其與諸葛亮之「死而後已」實乃同類之人。正例之外，反例則如前節已經節錄的〈與群下教〉，其總評曰：

讀此知剛愎自用者，非徒德否，亦係才短。司馬公諸賢苦口于介甫，而不能用。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此段評語的用意如前節所述，旨在稱頌諸葛亮之才德，然其稱頌之餘實以王安石為對比，透過其不接受司馬光等人之苦口勸說，強調剛愎自用之不可取，是《古文雅正》選諸葛亮文中透過孔明貶抑他朝人物最為顯著的一條例證。

以上所引皆是與異代人物的比較，至若同時之比較對象則僅見於〈說孫權〉的總評：

時操兵情，孔明陳其三，則公瑾籌其四患，然孔明實備於公瑾，何者？超、遂於時，未即有異志，操豈遂以此為返顧之憂哉？至馬無草、兵多疾兩事則不習水戰四字足以該之矣，孔明策操之眾為疲眾、荊之民為貳卒，以疲眾馭貳卒，而試之素所不習之水戰，故曰：「破操必也。」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然以視孔明，其智略大小何如哉？<sup>74</sup>

<sup>73</sup> 同前註，頁 14a。

<sup>74</sup> 同前註，頁 7a。

所謂「公瑾籌其四患」者，意指周瑜〈拒操議〉，該文亦被選入《古文雅正》，究其內容，「四患」則分別是「馬超、韓遂為後患」、「中國不擅水戰」、「盛寒導致馬無藁草」、「水土不服將生疾病」四者。蔡世遠於此以為「孔明實備於公瑾」，但其論述理由著實不夠充分：首先，馬超雖叛於赤壁之戰三年後，然而反叛之心非起於一朝一夕，於時曹操是否以馬超、韓遂為西北隱憂，實不得而知。再者，「馬無草」與「兵多疾」兩事是否以「不習水戰」四字即可概括？就「馬無草」而言，周瑜已明言此事導因於「盛寒」的氣候問題，與「水戰」並無相關；就「兵多疾」而言，《三國志·武帝紀》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sup>75</sup>文中使用「大疫」一詞，可見當時曹軍發生的並非僅為暈船等小事，而是嚴重、可致死的傳染病，自然與「不習水戰」更無相關。就事實而言，諸葛亮說孫權時並未提出「兵多疾」的關鍵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若仍要說「孔明之說較完備」或「孔明智略優於周瑜」，實未臻允當。因此，可以更進一步深究的問題是：當蔡世遠見到〈說孫權〉與〈破操議〉兩篇文章時以諸葛亮勝出，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理由，才導致於此文評語中出現先有立場的結論？此或可參《古文雅正》對〈拒操議〉的評語，其總評曰：

語皆了了，雄快之極。公瑾破曹，千古稱快。陸遜破昭烈、呂蒙殺壯繆，為吳謀，非不忠，然千載後皆不喜于呂陸，此公心也，正程子所謂惻隱之心也。<sup>76</sup>

此段評語中所謂「公心」，當指「蜀漢正統」之心。對蔡世遠而言，諸葛亮輔佐劉備，是為「興復漢室」的大業，能拯救天下蒼生於亂世兵燹之中，是故支持劉備與孔明實為「惻隱之心」的絕佳展現。在這樣的立場下，周瑜作為吳軍統帥，與劉備、孔明合作退曹自然是「千古稱快」之事。相對的，陸遜、呂蒙破劉備、殺關羽皆不利於蜀，故為後人所不喜。由此觀之，正統觀之影響蓋可視為蔡世遠以孔明優於周瑜的一個可

<sup>75</sup> 《三國志》，第1冊，頁31。

<sup>76</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35b。

能原因。除此之外，誠如習鑿齒〈側周魯通諸葛論〉所言：「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真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跡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已）〔未〕亡之日耶！」<sup>77</sup> 明白點出了周瑜不如諸葛亮處在於其未能忠於漢室，故孔明實為恪守君子之道的「大義」代表，周瑜則不然。蔡世遠在針對二人的褒貶上，觀點亦與習鑿齒有可相通處，尤其在旁批「為漢家除殘去穢」一語時有顯著的表現，其言曰：「假仁假義處。」<sup>78</sup> 事實上，周瑜稱「除殘去穢」云云與〈答李嚴書〉中的「滅魏斬叡，帝還故居」並無太大歧異，然於彼為「語本血誠」，於此則「假仁假義」，可見蔡世遠比較周瑜與諸葛亮時，著實同樣從「義」為切入點，諸葛亮與蜀漢除了為正統的一方，更有「仁義」的正當性，〈說孫權〉總評中所言雖未必公允，卻可作為此一現象的旁證。

綜上所述，在《古文雅正》中，被援引作為諸葛亮比較對象的人物實皆有所不如。究其原因，差異處則大抵落在道德修養等面向上：論「大義」則勝過子產、論「謹慎」則張浚弗如、論「度量」則遠超王安石、論「仁義」則周瑜虛偽，蓋可再次呼應針對諸葛亮個人的評價之語，「求志達道」、「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儒者氣象實為蔡世遠對其稱許備至的關鍵。

### （三）與其他評點本評語的內容差異

透過前文的討論，以及前言中提到的「二希」命名之由，可見蔡世遠對諸葛亮抱有高度崇敬之情，如此傾向將使得《古文雅正》相對於其他評點本凸出什麼樣的特色，此即本小節所欲解決的問題。惟於進行比對之前，必須先加說明的為清代古文評點本的共同特色及寫作目的為

<sup>77</sup> 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2058。其原文雖作「已亡之日」，然考周瑜在時，曹丕尚未篡漢，是以應為「未亡」。又此段資料轉引自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張氏於其文中考證篇題，認為原題〈周魯通諸葛論〉的「周」上脫漏「側」字，今從其說。詳可參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頁107、108。

<sup>78</sup> 同前註，頁35a。

何。對於古文評點的發展，現有研究成果不少，並且有著顯著的共識：即是與科舉考試關係密切。此以祝尚書之說為例，其〈南宋古文評點緣起發覆——兼論古文評點的文章學意義〉一文明確指出「科舉時文的全面程式化」正是「評點興起的歷史契機」，因此探討文章作法便成為古文評點本著成的核心意義，因其本身即是為科舉而服務的。且此一特色不只成立於南宋一朝，及至明清選本的編纂動機，亦多是一脈相承。<sup>79</sup> 知悉此一共性以後，本文始可據此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不過正如前言所示，在本文作為參照對象的諸選本之間，共同選文多僅〈出師表〉，因此下文亦將聚焦於兩表。

針對此論題，首先可以表格呈現《古文雅正》中評前後〈出師表〉的內容：

表3 《古文雅正》對前後〈出師表〉的評語

篇名	總評	旁批
〈前出師表〉	1. 從「謹慎」比較其與殷浩、張浚之高下。 2. 引安溪先生語，討論「南方已定」云云是否稍嫌自滿。 3. 考據字句問題。	1. 批「臣本布衣」稱「每讀此無不墮淚」。 2. 批「南方已定」稱「忠義薄雲霄」。
〈後出師表〉	1. 比較前表與後表的氣勢與歷史情境。 2. 引程子之言強調〈出師表〉堪與天日並垂。 3. 比較管仲與諸葛亮。	1. 批「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稱「開口便說破」。 2. 批「議者謂為非計」稱「六未解，全為此句開發」。 3. 批「孫策坐大」稱「見今北伐不可失」。 4. 批「關羽毀敗」稱「千古恨事」。 5. 批「死而後已」稱「韓魏公正得此意」。

<sup>79</sup> 說參祝尚書，〈南宋古文評點緣起發覆——兼論古文評點的文章學意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39期（2005.7），頁74-82。

從上表的整理可見，符合前引祝尚書之說，談論「文章作法」的評語僅有〈後出師表〉的前三條旁批，占比並不高。這樣的傾向與前言中所示其他古文選本的差異頗大，此先以最為通行的選本《古文觀止》為例。其書評前後〈出師表〉時，除總評外不見旁批，但有功能相近的「夾評」<sup>80</sup>，但夾評數量與《古文雅正》的旁批相差甚大，共計〈前出師表〉38處、〈後出師表〉56處。就內容而言，則可分為三類：其一即為符合前文所言探討文章作法者，如評〈前出師表〉「臨崩寄臣以大事」一句云「伏後遺詔句」，<sup>81</sup> 這類型夾評的目的性相當明確，即是分析文章結構，令讀者知悉字句段落間的關聯何在。其二則近似今日所謂「註釋」，旨在解釋生難字詞、歷史典故或標注讀音，且註釋對象可謂鉅細靡遺，如〈後出師表〉中註「孫策」為「孫權兄」、<sup>82</sup> 註「殆死潼關」補充曹操與馬超「潼關之戰」之概要<sup>83</sup> 等，皆是此例。其三即是以稱頌和憾恨等心情抒發為主的評語，如評〈前出師表〉「嘆息痛恨於桓靈」云：「後主寵任黃皓，後蹈覆轍，尤可嘆恨。」<sup>84</sup> 評「遂許先帝以驅馳」云：「觀其出處不苟，真伊、傅一流人。」<sup>85</sup> 若進而比較三類評語的比例，則可發現前兩類佔了顯著多數，而第三類在兩表中則合計不足十條，與《古文雅正》中以第三類評語為大宗的現象差異甚大。除此之外，第二類評語在《古文觀止》也頗多使用例，足見吳楚材叔姪對此的重視，相對的《古文雅正》則較少關注這類內容，尤其〈後出師表〉中言曹操之敗時，涵蓋大量曹操生平事蹟，需要「註釋」的內容不少，但《古文雅正》中卻仍不可見。

<sup>80</sup> 形式近似《古文雅正》中的「題下注」，於選文字句之間以兩行小字進行評點。其與「旁批」的相似處在於皆可隨文評點，不若總評大多僅能進行概括評論，因此下文進行比較時，除將總評互相對照外，同時將以「夾評」和「旁批」為比較對象。

<sup>81</sup> 《古文觀止》，上冊，頁277。

<sup>82</sup> 同前註，頁280。

<sup>83</sup> 同前註。

<sup>84</sup> 同前註，頁277。

<sup>85</sup> 同前註。

事實上，《古文觀止》中的三類評語分類可以完全套用在其他評點本中，並且呈現出高度相似的品評傾向，如《古文評注》的夾評中全然不可見第三類評語，《古文析義》與《古文範》分別僅有評〈前出師表〉時的「無限酸楚」<sup>86</sup> 和「字字血性中語」<sup>87</sup> 最為接近，其餘則皆是評析章法和註釋字詞。《古文釋義》中的第三類評語亦僅有評〈後出師表〉「鞠躬盡力」時的「痛心切骨」<sup>88</sup> 等寥寥幾條，為全部評語中的顯著少數。綜上所述，透過〈前出師表〉僅有的兩條旁批，以及〈後出師表〉中僅佔約半數的第三類評語，可以發現《古文雅正》相對於其他評點本，旨在個人的抒懷（對諸葛亮或蜀漢命運的嘆惋）以及對作者的評價（「忠義薄雲霄」等），論章法處不多，註釋字詞更非評點的重點，簡言之即是關注作者大於文章本身。除夾評與旁批外，總評亦可呼應此結論：《古文雅正》的總評除了〈前出師表〉的字詞考據以及〈後出師表〉論「氣勢」處以外，評點的對象皆側重諸葛亮其人。相對的，其餘諸本中除了《古文評註》中同樣有「耿耿不可磨滅」<sup>89</sup>、「古純臣進諫之風」<sup>90</sup> 等語外，《古文觀止》雖稱許〈前出師表〉之勤懇，然總評之末收至「自是至文」，可見其稱許仍在文章；《古文析義》言「六未解皆為『議者以為非計』而發」<sup>91</sup>、《古文釋義》稱「章法筆力，尤為兩絕」<sup>92</sup> 云云，更皆顯然可見其解析文章、教導作文的目的性。

在這樣的對比之下，明顯可見《古文雅正》更重視諸葛亮其「人」作為學習對象的重要性，蔡世遠以「修身」為「學文」之進路的文學觀亦於焉凸顯。<sup>93</sup> 這樣的觀念在《二希堂文集》中多有可見，如〈與林于

<sup>86</sup> 《古文析義》，卷九，頁 75a。

<sup>87</sup> 《古文範》，頁 200。

<sup>88</sup> 《古文釋義》，頁 275。

<sup>89</sup> 《古文評註》，頁 33。

<sup>90</sup> 同前註，頁 37。

<sup>91</sup> 《古文析義》，卷九，頁 78a。

<sup>92</sup> 《古文釋義》，頁 277。

<sup>93</sup> 這樣的文道觀在現有的蔡世遠研究中皆已得到注意，如趙友永《蔡世遠〈古文雅正〉研究》一文稱之為「贊襄文治，合道統文統為一體」、阮莉《蔡

九〉一文云：「非窮讀經史不能根柢盤深，而出之以雅醇。此文章之秘鑰也。」<sup>94</sup> 因此他所推崇的讀書人如齊汴子便是「所學惟先儒是程」的典範<sup>95</sup>，到底仍將學習的對象歸向至「人」，在向先儒的高度道德看齊之下，自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sup>96</sup>。這樣的文道觀無疑註定了《古文雅正》評語中「重人」大於「重文」的特殊傾向。且如此差異並不僅成立於〈出師表〉，綜觀全部的諸葛亮文，探討章法的評語仍僅有〈後出師表〉中的三條，其餘則皆如前兩小節所述，以稱頌孔明和比較人物為核心，展現了蔡世遠欲使讀者「所學惟先儒是程」的用意：如以〈策丞相亮詔〉強調「君子慎所擇」、透過〈自表後主〉強調讀書人應以「慎」和「廉」為自我要求、藉由〈與群下教〉明示為人應戒「剛愎自用」之習……，若此種種，皆可見得《古文雅正》比起如其他古文評點本般直接品評諸葛亮文，蔡世遠更加重視的其實是諸葛亮其人於字裡行間流露的高尚情操。這樣的例證除了已見前引的上述諸例外，〈隆中對〉的總評同樣明顯帶有這樣的目的性：「忠武侯與范文正公，皆年少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者，……讀書人當參觀之，自然有得。」<sup>97</sup> 將諸葛亮與范仲淹並舉，樹立讀書人學習之楷模、令學者「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的意圖頗為明確。

如此重視「修身」，以及將諸葛亮其「人」作為典範的作法，無疑與蔡世遠的理學家身份有著密切關聯：如前所言，諸葛亮的「儒者氣象」於朱熹筆下得到了高度重視，因而在其評價定位下接近完人形象，乃至成為後代文士心目中的理想典型。<sup>98</sup>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雖朱子思想對

世遠古文研究》則將其視為蔡世遠文章理論的重要內涵。導因於前行研究所言甚詳，故於此不擬深入探討，僅將簡單陳述其要，作為凸顯蔡世遠評選諸葛亮文特殊性的理論依據。另外，下引〈與林于九〉等篇目皆參考自趙友永一文，特此註明。

<sup>94</sup> 《二希堂文集》，《故宮珍本叢刊》第 592 冊，頁 153。

<sup>95</sup> 同前註，頁 120。

<sup>96</sup> 同前註，頁 52。

<sup>97</sup> 《古文雅正》，卷五，頁 4a、4b。

<sup>98</sup> 朱熹思想對諸葛亮形象建構的影響，可詳參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

諸葛亮的相關歷史評論影響甚深，但在南宋及其後頗為發達的古文選本領域卻從未有如蔡世遠這樣大量選入諸葛亮文的前例。清代選本已見前表，在此復以真德秀（1178-1235）的《文章正宗》為例，以凸顯《古文雅正》的特殊之處：真德秀作為朱熹的再傳弟子，無疑可視為朱子思想的嫡傳。然而即使是這樣所受影響甚深的理學家，在編定古文選本時，仍僅選入前後〈出師表〉，與其他單一作者的入選篇數相去不遠，並未可見有何特殊之處。

在這樣的對比下，蓋可見得蔡世遠除恪守朱子思想，將作為「明哲君子」、「忠誠之臣」的諸葛亮援以為闡明道義的例證外，其對諸葛亮的熱愛著實已遠超過往的理學家。誠如總評陳壽〈上諸葛亮文集表〉所言：「余雅愛慕公，凡公之文以及序論公之文，皆愛玩不置。況此篇極力表揚，頓挫曲折，尤為千古至文。」<sup>99</sup> 所謂「雅愛慕公」正是蔡世遠對孔明推崇備至的根本動機，更因此大量選入諸葛亮文，甚至連帶給予了陳壽「極力表揚，頓挫曲折」之表「千古至文」的盛讚。由此觀之，《古文雅正》的評語雖少有對文章的鑑賞，但卻可以見得編者對諸葛亮的高度評價，幫助我們更全面理解蔡世遠將孔明視為偶像與典範的根本初衷。

#### 四、結語

本文以《古文雅正》選入大量諸葛亮文的現象為研究動機，透過《古文雅正》本身針對諸葛亮的評語，以及蔡世遠和朱軾合編的《歷代名臣傳》兩條進路，觀察蔡世遠對諸葛亮的評價究竟為何，其中又是否與《古文雅正》的評選特色產生關聯，從而發現以下三點結論。

研究》。

<sup>99</sup> 同前註，頁21b。

首先，在《歷代名臣傳》中，透過與《三國志·諸葛亮傳》的對比，可以發現無論是轉引的他傳內容或納入的不合理事蹟，其根本用意皆大抵相通，即是意欲凸顯諸葛亮之德：楊顥、杜微兩例與禮賢下士相關，〈與群下教〉一段可見孔明察納雅言之度量，〈與李豐教〉反映其無私為國的耿耿忠義，「木門道之役」強化了他用兵時同樣以「信」為根本……，若此種種，皆是強調「孔明之德」的例證，而這也正是蔡世遠看待諸葛亮時最重要的著眼點：以其為「合乎孔子之道的『君子』」。在這樣的根本立場上，雖然《名臣傳》同樣引入了「空城計」等段落，但正如文末論贊所言，這不過是「囊底餘智」，顯然不是諸葛亮身上最重要的特質。

其次，在前述結論下更進一步觀察《古文雅正》中對諸葛亮文的評語，不難發現其實兩者頗有可呼應之處：首先即是強調孔明之「義」，這類型評語以〈正議〉、〈策丞相亮詔〉與〈與法正論治蜀〉最具代表性，可以見得在蔡世遠心中，其「義」非但昭著於當代，更足以作為後世楷模，同時也是勝過子產等一流名臣的關鍵。其次也一如《名臣傳》中強調的諸葛亮之「德」頗為豐富，《古文雅正》中的評語同樣也不侷限於義，如〈與群下教〉以王安石作為對比凸顯其「容人之量」、〈自表後主〉稱其「廉」與「謹慎」、〈答李嚴書〉言「語本血誠」等，皆是其例。最後，綜觀全部評語在評價諸葛亮時，僅有〈說孫權〉一篇言及「智略」，蓋於「用兵之謀」與「儒者氣象」的取捨上，《古文雅正》與《歷代名臣傳》的傾向亦可相通。

最後，相較於《古文觀止》等其他清代古文選本，蔡世遠於評點諸葛亮文時，對文章筆法、架構等技術性的內容評價甚少，反而大量著墨於孔明個人的「義」與修養。這除了是《古文雅正》得以立異的關鍵外，同時也能再次證成蔡世遠文學觀中「以『人格』引導『文格』」的傾向，在這樣的情況下，其論「文」時往往以「修身」或「效法聖賢典範」為重，因此評諸葛亮文時同樣毋須著墨於發掘筆力章法，而是將精力放在樹立讀書人的楷模。若將這樣的特色扣回其自序中提到之「其辭雅，其

理正」的選文標準，則能夠發現至少單就諸葛亮文而言，辭「雅」與否及其「雅」處何在當非蔡世遠的主要考量，諸葛亮在〈出師表〉等文中寄寓之「理」以及所呈現的「儒者先賢」樣貌反而是他更關注的內容，由此，蓋可見得雖然《古文雅正》以「雅正」為書名，然而在選入諸葛亮文的實際操作上，「正」的重要性對蔡世遠而言著實是更勝一籌的。

綜上所述，諸葛亮對蔡世遠而言，實為一合乎孔子之「道」、具備儒者氣象的君子典型。這也正是他「雅愛慕公」的根本原因，故而諸葛亮在其筆下被形塑成了「偶像」、「典範」一般的人物。同時，導因於蔡世遠看待孔明時超乎過往理學家的熱愛，選入其文之數量亦得以躋身前三，甚至勝過朱子；這樣的特殊視角更令《古文雅正》評諸葛亮文時以「人」為本，從而能夠在浩如煙海的古文選本中立異出彩、發出獨特的光輝。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漢】諸葛亮著，張連科、管淑珍校注，《諸葛亮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隋】王通，《中說》，收入《續古逸叢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六安塗氏求我齋所刊書，1871。
- 【宋】朱熹，《朱子語類》。同治正誼堂叢書本，1866。
-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康熙五十五年增訂合編本，1716。
- 【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清】曹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 【清】朱軾、蔡世遠，《歷代名臣傳》。同治三年重刊本，1864。
- 【清】蔡世遠編，林有席參評，陳守貽重校，《重訂古文雅正》。乾隆四十二年石竹山房刻本，1777。
-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收入李升召等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隆六十年杭州刊本，1795。

- 【清】余誠編，葉桂郴、劉果點校，《古文釋義》。長沙：岳麓書社，2003。
- 【清】吳闡生編，王基倫、王誠御、許妙音點校，《古文範》。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9。
- 【清】過珙，《古文評註》。臺北：宏業書局，1979。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二) 期刊論文

祝尚書，〈南宋古文評點緣起發覆——兼論古文評點的文章學意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39期(2005.7)，頁74-82。  
張子俠，〈《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2000.5)，頁74-79。

### (三) 學位論文

阮莉，《蔡世遠古文研究》，漳州：漳州師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  
張谷良，《諸葛亮民間造型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曾存發，《朱軾史學思想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趙友永，《蔡世遠《古文雅正》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劉奉文，《《三國志》版本的諸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Zhuge, Liang. *Zhuge Liang Anthology*.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Chen, Shou.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Ltd., 1959.
- Zhushi, Cai, Shiyuan. *Li Dai Ming Chen Jhuan*. The Republished Edition in the 3rd Year of Emperor Tongzhi, 1864.
- Cai, Shiyuan. *Republished Gu Wen Ya Zheng*. The Republished Edition of Shi Zhu Shan Fang in the 42nd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 1777.
- Cai, Shiyuan. *Er Xi Tang Anthology*.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Zhao, Erxun. *Draft History of Q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Ltd., 1977.
- Zeng, Cunfa. *The History Thoughts of Zhushi*. Nancha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dissertation, 2009.
- Ruan, Li. *Research on Cain Shi-yuan's Essays*. Zhangzhou: Zh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dissertation, 2010.
- Zhao, Youyong. *The Study on Cai Shiyuan's Guwenyazhe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dissertation, 2017.
- Chang, Cuiliang. A Study of Chuke Liang's Image in Folk. Hualia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octor's dissertation, 2006.

# The Features and Meanings of Cai Shiyuan's Comments on Zhuge Liang and His Articles ——Focusing on *Li Dai Ming Chen Jhuan* and *Gu Wen Ya Zheng*

Ding-Hong Xie\*

##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how Cai Shiyuan (蔡世遠) viewed Zhuge Liang (諸葛亮) and why he selected 12 Zhuge Liang's articles in *Gu Wen Ya Zheng* (古文雅正). I solve the first problem by analyzing *Li Dai Ming Chen Jhuan* (歷代名臣傳), which was also compiled by Cai Shiyuan. In this book Cai Shiyuan extremely emphasized Zhuge Liang's virtue, such as tolerance, integrity, and prudent character. And all of above were also highlighted in *Gu Wen Ya Zheng*. Based on the result, Cai Shiyuan actually took Zhuge Liang as a model of other literati, so he focused on the virtue instead of the skills when commenting Zhuge Liang's articles. It not only represents an intriguing feature by contrast to most of other important commentary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conveys Cai Shiyuan's special literature view as a physicist of Neo-Confucianism.

Keywords: Zhuge Liang (諸葛亮), Cai Shiyuan (蔡世遠), Gu Wen Ya Zheng (古文雅正), *Li Dai Ming Chen Jhuan* (歷代名臣傳), marginalia

---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